

资关系，新的产品、服务和生产程序推动了资本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部门进行自我扩张。总体来看，假设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善与恶的决斗（Armageddon）或基本的社会转型，其终点只有当所有社会劳动进入工资领域、所有产品及服务都作为商品交换时才会到达。当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朝着这一理论终点“进步”。尽管受到自动化的影响，但工资形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到21世纪，工资形式已经在全球推行，并对所谓的不发达国家造成了深刻冲击，在前苏联和中国表现得尤为显著。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就认识到了这种扩张的深远重要性。这位美联储主席在2005年证实，“这些工人，加上来自印度——这个国家如今在参与世界贸易体系方面同样经历着一个显著增加的过程——的工人，使整个劳动力的供给几乎翻了一倍”。^[42]在发达市场经济体中，工资的范围曾经不断向前延伸，包括了以前的自由职业者和数量前所未有的女性。同时，21世纪的世界市场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对任何国家或地区来讲，要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将自己解脱开来或者解脱后保持自我都非常困难。

这是历史的、分析的“矩阵”，当代信息转型必须被置入其中考虑。对于信息理论家认为信息意味着组织的观点，我们表示赞同；但信息本身是有条件的，并且是被它所处的社会制度和关系构筑起来的。今天，这些社会关系正在史无前例的范围内创造出特殊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后工业主义者认为信息的价值在于它作为资源的内在属性，对此我们表示反对：信息的价值仅仅来自它向商品的转变——通过工资劳动和市场在历史上被不断运用于信息的生产和交换；信息作为一种资源的价值被重估，其内涵被重新界定。工资被持续地强加到新的社会劳动领域，尤其在过去的—个世纪里包含了信息领域。市场发展成了决定性的交易机制，该机制适用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并同样涵盖到了信息。由于这些原因，与那些认为信息是非生产性的政治经济学家相反，我们最终认为，信息商品已经变成当代资本在世界市场体系内、